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探论

□张彧*

摘要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共编有七部馆藏古籍目录。从内容性质上分,《大学堂书目》《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属于综合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属于专科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属于善本目录。这些馆藏古籍目录为我们了解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可以为当下的古籍编目及版本鉴定工作提供参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藏古籍目录 古籍编目 学术价值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3.013

中国近代随着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创建,书本式馆藏目录开始编辑印行。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古籍目录七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1904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称京师大学堂图书馆。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部,1930年又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了方便表述,本文统一称“北京大学图书馆”。业界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所编馆藏古籍书目有所关注,比如吴晞先生《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中的《新型的官学藏书——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一章,对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各项工作有过很详细的研究,对《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有过简单介绍^[1]。近年来,姚伯岳先生《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记略》等文章已对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时间、地址、各项规章制度、历任负责人的事迹及相关贡献等有详细的考论^[2-3]。姚文讨论范围为京师大学堂时期,因此对民国时期编纂的馆藏古籍目录未有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做较为全面的考

察,以弥补有关研究的未尽之处。

古籍编目工作一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重心,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章《设官》第七节云:“设藏书楼、博物院提调各一员,以经理书籍、仪器、标本、模型等件^[4](166)。”1907年《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云:“经理官掌理馆中书籍事务,图书馆供事人掌书籍出入,登记簿录,整理各书籍图报,检查收发书籍,及各项笔墨等事,均承总理官之命^[5]。”可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提调官及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经理官主管古籍编目工作,具体的编目工作由供事人完成。北京大学图书部时期,古籍编目工作由编目课负责^[6];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期,则由中文编目股负责^[7](5)。

北京大学图书部从1918年起,对新进图书采用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而略加变通的图书分类法分类典藏,并开始编制分类目录、著者目录、书名目录三套卡片目录,至1920年分类目录已经编成。但其中文旧书仍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未改编^[8]。1935年《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云:“书本目录所以辅助排片目录,最便观览。本馆前后编印目录七种,可供索检。列举如左:《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政府出版品目录》(民国十五年)、《国立

* 张彧, ORCID: 0000-0001-9746-3105, 邮箱: zy1992@sdu.edu.cn.



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民国十九年)、《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民国二十一年)、《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民国二十二年)、《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丛书目录》(印刷中)、*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Library Quarterly Booklist* (自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每三月出版一次)、《国立北京大学周刊图书馆副刊》(自民国二十三年起每星期六出版)^{[7][16]}。”这七部目录中,有四部是古籍目录。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七部古籍目录,既有综合目录,也有专科目录、善本目录,现缕述如下。

1 综合目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综合目录包括《大学堂书目》《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共三部。

1.1 《大学堂书目》

该书目刊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目录,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最早的馆藏古籍书目,2013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进行古籍未编书的编目时发现。关于该书目的基本情况,姚伯岳先生《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一文中已经有很详细的介绍,这里仅简要叙述。该书目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部共6部,每一部下不再分类,每书仅著录书名、部数、册数,是一部简明目录。据姚伯岳先生统计,该书目共著录古籍约44964册^[2]。这部目录的特色是设立“西学”部,比如西学部首页即著录:“《大英国志》五部,每部四本;《泰西新史揽要》三十部,每部八本;《日本国志》二部,每十本;《万国史记》四部,每八册;《日本史略》四部,每一册;《法国志略》二部,每十册;《日本史记》一部,计一百册;《地理志略》十部,每一册^[9]。”这些西学书大多是石印本、铅印本,且多为译著,如《泰西新史揽要》是晚清时期一部重要的西学译著,《万国史记》是日本冈本监辅用汉文编译的一部关于当时亚欧各国制度的著作。《大学堂章程》所规定的10门共同必修课中,属于西学者有“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4][151]},约占一半,这些西学书籍的著录正是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方针的直接体现。《大学堂书目》西学部著录的图书与大学堂所开设课程密切相关,很有可能就是筹备京师大学堂时购入的西学课程教学参考书。

1.2 《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

该书目为油印本,线装,编成于宣统二年(1910),其著录包括截至宣统二年初所购古籍、译文书、东方文书和大学堂讲义,供教习和学生借书时参考使用,是当时的馆藏目录。《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例言称“本堂图书馆篇籍浩繁,用付劂刷尚须时日,兹编藉供本堂管教各员及学生等借书检阅之用,并非定本,故名曰‘图书草目’”^{[10][1]},”现在须用书目甚急,所有分别部居,诸从草创,未经详校,不免舛误”^{[10][2]}。可见,它是一部仓促编目以应急需的目录。其例言末有题记“庚戌三月三日图书馆经理官王诵熙识”^{[10][2]}。王诵熙于1906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经理官,这部草目是他在经理官任上第五年时所编。

该书目除东文译书及各种舆图外,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五部各为起讫,每一部下亦不再分类,按《千字文》顺序排架编号。其著录项目有书名、部数、函数、本数,无作者名称,个别书下有卷数;如果有一部,则录作“一部,×本”,或者“×函,×本”。偶尔有在书名前著录版本,比如“明刻《史记》,三十本”“明刻《史记》,十二本”^{[11][38]},有时在本数下注明何时所购,比如“五洲同文局《二十四史》,七百一十本”下小字注“宣统元年购”^{[11][46]},紧接着又著录一部副本,其下注“宣统二年补购”^{[11][47]}。据笔者统计,该书目著录的各部古籍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部	911	11939
史部	1817	38591
子部	818	8355
集部	1714	17333
丛书	167	16937
总计	5427	93155

因为这只是一部草目,其本身可能存在误记、漏记之处,而且有很多古籍只著录函数而未著录册数,比如“《五礼通考》,十函”^{[11][36]},这些笔者仅计入部数而无法统计册数。此外,由于该书目为油印本,有些记录册数的文字湮漫模糊,也未能计入。因为这两个原因无法统计册数的古籍有208部。但通过该书目我们可以知道,截至1909年,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所藏古籍至少有93155册。与《大学堂书目》相



比,其著录至少多了 48000 余册。由于“庚子事变”中大学堂藏书楼藏书大部被毁,所以该书目反映的基本是 1902 年藏书楼重建后所收藏书的情况。

1.3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编成于民国十九年(1930),它将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部普通书库按四部插架陈列的普通古籍分格编录。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正为其所藏地方志、善本书单独编制分类目录,并拟订先由《北大图书部月刊》分期刊登,与此同时还计划将该草目所著录古籍再详为分类后,同样由《北大图书部月刊》陆续发布,待以上全部工作完成后,再将上述所有书目一并厘定成正式、完整的馆藏书目^[12]。

该草目分为经部、史部、诸子部、集部四部,而将类书类单独分类,放在集部之后。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类书类只收事类,也不完整。每一种书按照插架顺序排列,著录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插架格号,类书类尚无格号。它也是一部简明目录,与之前的草目不同的是,它对每一种书都著录版本,比如“《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清同治九年崇文书局重刊明震泽王氏本,二十四册,十、一”^{[13](50)}。可见其版本是清崇文书局重刻明嘉靖震泽王氏刻三家注本《史记》,因此该书目是一部版本目录。而且,该书目注重区分原刻本、翻刻本,原刻本如“《易确》二十卷《自序》一卷,清许桂林撰,清道光十七年原刊本”^{[13](6)}、“《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补遗四卷,清沈德潜选,清乾隆二十四年第一次刊本”^{[13](186)};翻刻本如“《书经述》六卷,清许祖京撰,清同治十三年重刊陵华堂本”^{[13](6)}、“《邵亭诗抄》六卷,清莫友芝撰,清同治五年江宁三山客舍修补本”^{[13](306)},较《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的质量更高。笔者对该书目所著录古籍的数量做了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部	339	5252
史部	380	8492
诸子部	768	3296
集部	1101	8510
类书类	33	656
总计	2621	26206

该书目虽名曰“草目”,只著录普通古籍,但每一部均著录册数,与《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相比更加细致,但由于该书目仅著录馆藏部分古籍,所以无论部数和册数都少了许多。通过对比还发现,该书目著录的古籍在《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中几乎都有著录,反映出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入藏的普通古籍并不多。

2 专科学目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只编有一部馆藏专科学目,即《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该书目的编者是张允亮,1933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铅印本。张允亮(1889—1952),字庾楼,河北丰润人,先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一名藏书家,博闻强识,精于鉴别,还编有《故宫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等目录。1933 年编撰此目时,张允亮尚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笔者推测该书目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请其编成。其体例按省划分,著录方志书名、卷数、纂修朝代、纂人、版本、册数,比如“《泰安府志》,三十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五年颜希深修,成城纂。原刻本,二十册”^{[14](20)},如果有多部,还在版本后注明,比如《江山志》“原刻本(两部),十二、八册”^{[14](5)}。附录有二:一为乡土志,著录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各 1 种;二为乡镇志,著录江苏 4 种,浙江 2 种。书末附有地名通检,按照地名笔画排列。据笔者统计,该书目共收方志 621 部,8149 册,基本反映了京师大学堂建立到 1933 年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地方志的情况。

3 善本目录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除了编有综合目录、专科学目外,还编有善本目录,主要有三部善本目录。下面,笔者按照其成书的先后顺序综论如下。

3.1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

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的第一部善本书目,由黄文弼编著,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2 年出版,铅印本。黄文弼(1893—1966),考古学家,1918 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1922 年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部编目工作。该书目即黄氏在图书部整理贵重书库时编成,编目时由各书库搬来的书籍杂陈一室,黄氏随理随编,只用了三个月就竣事^[15]。黄氏熟悉古籍版本目录之学,曾发表



有《拟编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书》《对于改革中国图书部类之意见》等文章,可见他的编目工作具有扎实的目录学理论基础。该书目分为八类,分别是经类、小学类、史类、地理类、子类、类书、集类、抄本,实际上是经类、史类、子类、集类、抄本五大类,只不过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部的小学类、史部的地理类、子部的类书类单独列为一类,将抄本单独分为一类,是其独创。该书目为表格式,每一列分为书名、卷数、撰人、版本、号数,版本栏除著录版本类型外,还间记其递藏源流、是否初印、藏书印、有无批校等,是一部有简明提要的善本目录。笔者对该书目所著录古籍的数量做了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类	109	1138
小学类	25	153
史类	82	1646
地理类	24	349
子类	53	408
类书	12	247
集类	17	461
抄本	52	513
总计	374	4915

可见,该书目共著录善本374部,4915册。多著录明刊本、清初刊本,以及稿本、旧抄本、活字本,还有域外刊本。由于其编纂仓促,而且“南归又未加审校即以付印”,故“错误罅漏洞时见”^[15]。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由此了解到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到1922年北京大学图书部这段时期内所积累的善本数量,大致上接近5000册。而且通过该书目所著录的旧藏源流可以看出,到1922年,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所捐古籍仍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古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2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的第二部善本目录。该书目编订于193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铅印本,共5册。该书目未题编者姓名,但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有云:“比起民国二十一年张庾楼先生为本馆所录的善本书,差不多已经多出一倍了^[16]。”白化文先生也曾回忆道:“北大图书馆并非没有一部善本书目,

1930年前后,张允亮先生就编过一本,书名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只是反映李氏、马氏书未入藏前的情况^[17]。”据此,该书目的编者应为张允亮,其编成的时间是1933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该书目第一册书衣铃有“北平国会街北大第五院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蓝印,其收录善本范围下限至明刻本,而附以校本、稿本、抄本及罕见的禁书^[18]。按照《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的标准,清代乾隆及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都算善本,可见该书目划分善本的标准远较当今严格。该书目采取四部分类法,然其例言云:“馆藏丛书目及方志目编校已竣,当继续付印以饷阅者”^[18],故该书目不收地方志、丛书。

该书目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版本项区分先印、后印。如“《六书统》十二卷,元杨桓撰,元至大元年刻明印本”^{[19](9)},可知该书为后印本;又如“《嘉定四先生集》,清康熙间陆廷灿修补明崇祯二年谢氏原刊本”^{[19](54)},可知该书为清代修补版的后印本而非明印本。笔者将该书目所著录古籍的数量做了统计,如表4所示。

表4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部	136	1331
史部	196	3398
子部	178	2398
集部	227	3178
总计	737	10305

统计发现,该书目共著录古籍737部,10305册,基本上反映了1933年以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古籍的规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目第一册书衣内面有“比较民十一黄文弼编《北大图书馆贵重书目》所载少了很多/续记”钢笔题记,不知何人所书,可能是题记者所见黄目著录的古籍很多不见于该目,进而怀疑这些古籍有所散佚。

3.3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的第三部善本书目是1948年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铅印本。该书目所著录的善本古籍,以在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会上所展为限,因此并不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全部善本古籍。这次展览的善本古籍,全部是由当时的专家学者选取,1940年至1942年购入的李盛铎木犀轩藏



书,由赵万里先生挑选;李氏藏书中的和刻本古籍,由宿白先生选取;其余的馆藏善本,都由王重民先生选取。“虽然他们选择的标准不能讲若画一,但都极严谨”^[16]。最后所附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展览目录,毛准认为“非特给予研究《水经注》的学者以最重要的南针,并且告诉普通读书人以怎样收集材料和用材料的方法”^[16]。据落款“胡适,三十七、十二、八”可知,其解题为胡适于1948年12月8日亲自撰写,为研究《水经注》版本的学者提供了治学门径。

该书目的分类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抄本、小说戏曲、朝鲜刻本、日本刻本、《水经注》版本展览目录九大类。除《水经注》版本下又分为宋刻、明抄宋本、明刻本等九类外,各大类下不再分小类,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详细著录每一部善本的书名、卷数、版本、册数,然后是解题,比如:

礼记正义 存一卷 宋绍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元补修本 一册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此本俗称越州本,又称八行本,合疏于注,自此本始。有元人“君子堂”“风流八咏之家勛谊颜忠书记”“吴兴沈氏以万书世家作文□”三印,及明晋府“敬德堂藏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二印。蝶装。内阁大库书。^{[20](1)}

这条解题详记《礼记正义》的作者、钤印、装帧形制、递藏源流等,虽然未记其行款、版式,却简明扼要,且重点指出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是宋代经、注、疏合刻本之始,可以为治经学文献学者提供指导。其解题有时还记古籍版本的避讳字,比如南宋建阳坊刻本《周礼》,云其“宋讳避至‘慎’字,简有不避者”^{[20](1)},为研究者进一步判定其刊刻的具体年代提供了线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目录著录了日本刻本、朝鲜刻本的汉籍,这些古籍多是中国古籍的翻刻本、覆刻本、抄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原刻本稀见,比如宋人总集《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该书目录著录有明正嘉间朝鲜铜活字印本,其解题云:“是书自宋绍熙后,从未覆刻,故传本绝稀,此朝鲜本,亦未见中外著录”^{[20](135)}。该书的中國刻本仅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一部,其余皆为抄本,无疑朝鲜印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第二,有些原刻本已经亡佚,比如日本元和七年(1621)铜活字印本《新雕皇宋事宝类苑》,此书据宋绍兴麻沙本重刻,为“中土久佚”^{[20](141)}。该书目录能够著录汉籍

的日本刻本、朝鲜刻本,将其视为善本,可以说眼光独特,别具一格。笔者也将该书目录所著录古籍的数量做了统计,如表5所示。

表5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著录数量统计

版本	部数	册数
宋刻本	33	316
元刻本	26	152
明刻本	197	2008
清刻本	11	69
抄本	91	614
小说戏曲	82	582
朝鲜刻本	10	15
日本刻本	47	406
《水经注》版本	40	未详
总计	537	约4162

经统计,该书目录共著录古籍537部,总册数在4162册以上(其中40部《水经注》册数未详)。这是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少见的有解题的古籍善本目录,作为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会展览书目,其古籍的择取及提要的撰写皆由当时著名学者所为,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4 分析和评价

从分类方法上看,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基本都是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而略有变通。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例言云:“一,此目虽依四库分类而于其部次之未安者则不强从,又四库大类之中更分子目,兹编以卷帙无多,不复细注,致涉琐碎”^[18]。该目基本上沿用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二级分类而有所调整,经部将“五经总义类”改为“群经总义类”^{[19](7)},又将其置于四书类之后,无《孝经》类;史部将诏令奏议类分为诏令类、奏议类两类,无职官类;子部道家类后有附录,只著录清乾隆五十二年抄本《归真要道》,后加括号备注“道教”^{[19](21)};集部无《楚辞》类。又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草目》经部将《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与五经总义类合并为群经总义类^{[13](22)},后又增加石经类、纬学类^{[13](31)}、经学丛刻类^{[13](32)}三类;史部将《四库全书总目》职官类降为职官之属^{[13](87)},与政书类合并为经政类;子部增加古子类^{[13](101)}、子抄类^{[13](172)},且佛教类收录大量翻译的佛教经典^{[13](114-144)},而《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著



录的主要是中国佛徒所撰有关中国佛教史传及佛典目录类著作。

从编撰体制上看,除《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有提要外,其余古籍目录均无提要,为简明目录。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著录书名、部册数、函数,而《大学堂书目》仅著录书名、部册数,是七部古籍目录中最简明者。

从内容性质上看,这些古籍目录多为版本目录,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部藏书草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四部。这四部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录,多能做到准确、精细,比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部藏书草目》著录版本区分原刻、翻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版本区分先印、后印。

因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清末民国时期久受战乱的影响,有些书目在编著时比较仓促,存在一些疏误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有些书目的类目命名不够准确,比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在礼类下增“乐律天算”之属,与三礼各属并列,却只著录《乐律全书》《陈氏乐书》《礼乐书》《皇明乐律书》《乐典》《律吕正声》《乐经内篇》七部乐类古籍^{[21](8)},而未收录天文算法类古籍。

有些书目的分类标准不统一,比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部藏书草目》子部单独划有“古子”一类,只收录成书于先秦秦汉时期儒家、道家、兵家、术数四类的著作及其后世注本,如《老子道德经解》《庄子集解》等道家类古籍,《孙子十家注》等兵家类古籍,《荀子集解》《孔子家语》《白虎通疏证》等儒家类古籍,《太玄经》《太玄别训》等术数类古籍^{[13](101-102)},此后却又著录宋代以来的儒家类、明清以来的兵家类、汉代以来的术数类古籍,既按照学术派别划分,又按照时间划分,标准不一。

有些书目的著录项存在遗漏之处,比如《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遗漏了某些古籍的册数,又比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部藏书草目》在“儒家”类古籍后收录佛教古籍,却无相应的类名^{[13](89)},或遗漏“佛教”二字,因为此类后著录有“道教”类^{[13](155)}。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的七部古籍目录虽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总体上看,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这些目录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各个时期的古籍收藏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虽然有些目录在当时为应急需编撰得比较匆忙,有的只著录了部分藏书,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规模。

其次,部分目录还著录了古籍的递藏源流,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古籍旧藏何处,或者从何处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的版本项就多著录递藏源流,比如《周易说易》著录:“明嘉靖己亥年刊本,旧藏三山陈氏,又巴陵方氏”^{[21](3)};《焦氏笔乘》著录:“明刊本,旧藏北平黄氏万卷楼”^{[21](27)};《石室私抄》著录:“明刊本,旧藏日本佐伯文库”^{[21](28)},等等。

最后,这些目录可以为当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版本鉴定及编目工作提供借鉴。比如,“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著录“《风俗通义》,宋刻本,存卷4—10”^[22],1948年善本目录则著录为:“《风俗通义》,存七卷,元刻本,一册,汉应劭撰。此元大德间无锡重刻宋嘉定丁黼本,与《白虎通》同刊,前人谓即嘉定本,盖误。此书元以前刻本均佚,此本元刻元印,纸背又係元季地亩册子,可宝也”^{[20](14)}。很明显,1948年善本书目与数字资源库著录的是同一部书。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亦将该书著录为“元大德间(1297—1307)无锡重刻宋嘉定丁黼本”^[2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风俗通义》卷首有“大德十四年李果序”,“大德十二年谢居仁序”及“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义》序”(即应劭序),其卷尾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旧藏家及公私书目均将其著录为元大德间重刻宋本。经笔者目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字体、版式、行款与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完全相同。而纸张又是古籍版本鉴定的另一重要依据,古人敬惜字纸,有时公文纸、地亩册也用来印书,当时的鉴定者据纸背地亩册的时代断定《风俗通义》是元印本,证据确凿。因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是元大德间重刻宋本,为元刻元印。“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的著录不太准确,或可参考1948年善本书目做出调整。

综上,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情况,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以为今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提供借鉴和启发。



参考文献

- 1 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68.
- 2 姚伯岳.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6):103-108.
- 3 姚伯岳.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记略[J].图书馆,2018(12):46-51.
- 4 京师大学堂章程[M]//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 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M]//王学珍,张万仓.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3.
- 6 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M]//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502.
- 7 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M].北京:国立北京大学,1935.
- 8 国立北京大学略史.北京大学日刊[N],1920-12-17(3).
- 9 李昭炜.京都大学堂书目·西学[M].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1a.
- 10 王涌熙.《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例言[M]//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北京:京师大学堂图书馆,1910.
- 11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第一册[M].北京:京师大学堂图书馆,1910.
- 12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识语[M]//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组,1930:1.
- 13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组,1930.
- 14 张允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组,1933.
- 15 黄文弼.《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跋语[M]//黄文弼.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2:1.
- 16 毛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序[M]//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1948:1.
- 17 白化文.承泽副墨[M]//白化文.白话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147.
- 18 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例言[M]//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组,1933:1.
- 19 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组,1933.
- 20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M].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1948.
- 21 黄文弼.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2.
- 22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DB/OL]. [2022-09-20].<http://rbd.calis.edu.cn/aopac/indexold.jsp>.
- 23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收稿日期:2022年9月20日

修回日期:2022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支娟)

An Overview of the Catalogu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piled by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Zhang Yu

Abstrac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ad compiled a total of seven catalogu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stinguished by the nature of their content, the *Daxuetang Shumu*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Daxuetang Tushuguan Tushu Caomu* (*Draft List of the Books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Library*) and *Guoli Beijing Daxue Tushubu Cangshu Caomu* (*Draft List of Books Held by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could be classified as comprehensive catalogues, the *Guoli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Fangzhi Mu* (*List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could be classified as a specialised catalogue, the *Guoli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Guizhongshu Mu* (*List of Valuable Books of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Guoli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Shanben Shumu* (*Catalogue of the Fine Editions of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and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Shanben Shulu* (*Catalogue of the Fine Editions of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could be classified as catalogue of rare books. These collections are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text catalogues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will be with highly valuable for research of current textual bibliography work of ancient texts.

Keyword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atalogu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Cataloging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cademic Value